

目 录

追忆朱自清.....	陈竹隐 (1)
反对军阀的进步报人林白水.....	张次溪 (26)
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	张琦翔 (35)
五四时期的长沙周南女校.....	全国妇联妇运史室 (50)
漫谈早期的清华大学.....	黄炯华 (63)
旧南开中学办学的一些作法.....	杨志行 (82)
我和明月社(上).....	黎锦晖 (90)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一).....	刘开渠 (128)
铁马响叮当	
——敦煌的春天.....	常书鸿 (154)
我的舞台生活(二)	
——七年坐科生活.....	袁世海 (194)

追忆朱自清

陈竹隐

身世 事业

朱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名字含有“春华秋实”之意。由于三代人定居扬州，所以自称“扬州人”。他的祖父为人谨慎，在江苏东海做了十多年的承审官。父亲朱鸿钧，字小坡，



1922年朱自清留学英国时留影

母亲周氏。当时都随祖父在东海任所。佩弦出生于东海，由于两兄幼殇，他就成了长子长孙，倍受家庭宠爱，小时在耳上还佩戴着金质的钟形耳环。他们兄妹共四人。佩弦幼年在家由父母启蒙自

课，后在私塾读经书、古文、诗词等。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很快就学通了国文，又在旅扬公学学了英文。他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毕业时，还得到了品学兼优的奖状。在校时，他非常喜欢文学，立志做文学家。一九一六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寒假，他回扬州，遵父母之命与扬州名医武威三先生的女儿武钟谦结婚。

佩弦的祖父母去世后，家境便一天不如一天，经济上很拮据。父亲虽然做着官，却一直廉洁自守，没有积蓄，所以给祖母办丧事都要借钱。佩弦二十岁时，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觉得按部就班地读书是有困难的，于是决定跳班投考北京大学本科，并改名朱自清，字佩弦。一九一八年，他考入了哲学系。这时，他们家中常靠借钱供孩子们读书。一直到佩弦毕业作事了，家里还欠着几千元的债，都是后来一点点还的。这样的景况使佩弦对穷苦人的生活有体会，并富有强烈的同情心。

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正值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佩弦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参加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并与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建立了友谊。他参加了《新潮》杂志的编辑工作，不断在学生办的周刊上发表新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提倡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点燃了佩弦心中的火，诗的激情在他心中翻腾，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他发奋攻读，三年内修完四年的课程，于一九二〇年提前毕业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佩弦觉得文学可以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可以揭露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可以启发教育人民，文学可以救国。由于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他很快走上了文

学创作的道路。

佩弦毕业后，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中国公学、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十中、白马湖春晖中学、宁波四中任教五年多。佩弦的教学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奔波于两校兼课。他虽对教书生活有时不满意，但对教学却十分严肃认真，从不迟到早退。课堂上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甚至满头大汗。他对学生管教很严，但与学生关系却很融洽。他经常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学生也常到他的住所去交谈。在温州时，他把新文艺的火种带到了那里，温州中学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他要求学生交作业不许误期或敷衍，甚至对学生作业格式都有具体规定：作文本第一页要空下来，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查阅。而他自己则不仅认真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还细心热情地批改学生们在课外所写的大量不成熟的作品。

这期间，佩弦也时常与文学研究会成员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先生讨论新诗问题，民众文学问题。又创办了《诗刊》，并不断发表新诗，以提倡新文化运动。他在诗歌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力，以抒发他的感受，歌颂光明，揭露黑暗。“五四”运动落潮后，佩弦思想有些彷徨，但强烈的正义感促使他排除一切困扰，努力振作起来。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长诗《毁灭》，用“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的诗句，表现了自己要脚踏实地前进的决心。他又写了《赠友》一诗，歌颂了“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共产党员。他为“五卅”惨案作《血歌》一首，痛斥了帝国主义的暴行。佩弦用他的诗歌为正义呐喊。与此同时，佩弦的诗歌和散文在艺术

上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长诗《毁灭》引起诗坛的注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评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他以认真教学、勤奋写作，将自己献给了青年，献给了新文学事业。

一九二五年，佩弦经俞平伯先生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佩弦从此便一生就任于清华大学。

当时的北京，旧文学的市场很广，书店里出售的都是旧文学书籍。佩弦认为应该开发新文学园地，扩大新文学市场，使新文学大众化。他与俞平伯先生等十人商议决定，每人出一份钱开一个“景山书店”，专门出售新文学书籍、刊物，并请了一个人专门负责经销工作，书店的收入就维持这个人的生活。而出股的十个人都没有收入，纯粹是为推广新文学尽义务。当时，佩弦他们就是这样为新文学开拓道路的。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逼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我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却联合美、英等七国公使，提出无理条件，并在天津附近集中各国军队，准备将武装干涉升级。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工人、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到执政府门前去请愿。佩弦也与清华大学学生一起，亲身参加了这次集会，参加了游行请愿，亲眼目睹了在执政府门前打死四十多人，重伤二百余人的“三·一八”惨案。回来后，他以极端愤怒的心情写成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详细地叙述了惨案发生的事实经过，直言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他写道：“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

胞的枪弹’，我们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以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在这篇文章中，佩弦还表达了对学生英勇不屈精神的真诚钦佩，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怕”的心理。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诚朴正直，而且也说明他在斗争中变得勇敢了，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

在这次惨案中，清华学生韦杰三惨遭杀害。佩弦很是痛心，写了《悼韦杰三君》一文。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时局剧烈动荡。这时，有人投敌高升，有人无耻出卖，有人胆怯害怕，有人脱逃颓废……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佩弦在苦闷，在思索。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种惶惶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以及对妻子儿女的顾念，使他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去战斗；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也使他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追求光明，他洁身自好。他象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并用这种“自清”精神启发人们。在这种心情下，他写了《荷塘月色》。此时，他还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九二九年，佩弦的夫人武钟谦病逝了，他很悲痛，写了《悼亡妇》一文，来寄托哀思。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并企图一步步灭亡中国。在这国难当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佩弦又振作起来。他一步步地踏着一一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前进着。

婚事 家庭生活

我家世代书香门第，原籍广东，但从高祖起就迁到四川了。我父亲排行第二，名叫陈正新。我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仅靠父亲教些散馆及在估衣铺工作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是很清苦的。当时四川女孩子念书的很少，而我家比较开明，不仅男孩子能念书，女孩子也都读书识字。

我出生于一九〇三年五月，在兄妹中排行最小。我从小是三姐教识字，八岁进私塾，长大一些了，父亲就不让出去念书了。那时，我哥哥们常把买到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带回家，我便也在读书中得到长进了。

我十六岁时母亲病逝，一百天后，父亲由于忧伤与贫困也去世了。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生好义，肯帮助人，从不趋炎附势。这种洁身自好、清高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父母病逝后，我便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了离开家庭独立学习的生活。在省一女师我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也学习了《左传》、《礼记》、《易经》及古诗词。学校浓厚的学习风气，严格的学习要求，打下了我坚实的学习基础。当时我受新思潮影响，认为女子要独立生活，不要依附男子。于是从一女师毕业后，我便与廖书筠等三个女同学离开成都到青岛去报考电话局女司机（女接线员）。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多，觉得还应该再学习，于是到北京考取了艺术学院，从此我开始了“工笔画”的学习生活。

在艺术学院，我曾受教于齐白石、肖子泉、寿石公等先生。

学习了哲学、美术史、古文、昆曲等课程，并接触了进步学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还拜见了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

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我这样一个从小受封建教育，又在时代的洪流中接受新思潮洗礼的女学生，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从艺术学院毕业了。我先在第二救济院工作，强烈的正义感使我憎恨那校长克扣孤儿口粮的卑劣行为，因此，便辞去了这一工作。而后便一边教一个姓沈的太太学画，一边到我的老师浦熙元那儿学习昆曲。

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因为我常到浦熙元老师那儿去参加“曲会”、老师看到我一天天长大了，北京也没亲人，便很关心我的婚事。他就与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导师叶公超谈起我，并请他帮忙。这一年

四月的一天，浦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陪坐的还有两位清华大学教授。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气，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席间我们很少讲话。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



朱自清与陈竹隐1931年结婚前

在北京中南海合影

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当时我却并不以为然。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潋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我逐渐体味到他写文章真是严谨认真呀！一次佩弦拿来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词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我还真读好了句读呢。我心里很得意，佩弦也很高兴。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但都是倾心相待。佩弦话虽不多，却使我感到很诚恳，实实在在地关心我。

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六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我那时才二十四岁，一下子要成为六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是的，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象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

的人，应该有人帮助他，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而六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六个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一九三一年我便与佩弦订婚了。

一个月后，佩弦便到欧洲去游学了，他要去考察欧洲的文学、戏剧、诗歌，以便更好地提倡新文学。在国外，他仍很关心国家的事情，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终日忧心忡忡，在给 my 的信中一再写到自己焦虑的心情。他听到有人说中国没希望了就很愤慨。他认为中国只是政府不行，只要有好的政府，让有能力的人秉政，中国就会好起来。

一九三二年七月，佩弦由威尼斯回国，我到上海去接他。那时北京结婚还要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八月四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凯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了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蒂克的浪漫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们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此后，我们共同生活的十七年的时间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作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

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十一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十一点前睡过。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也不听。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深怕耽误时间。时间对他比什么都宝贵，正如他自己所写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他真是抓紧匆匆来去的分分秒秒地读呀，写呀！连每天我们说话的时间都很少。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苦恼，但渐渐看到他对事业的热爱，看到他不断发表作品，想到他对学生、对文学的贡献，常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想我应该支持他，我也要为他事业的成功付出代价，所以我便把家务事都承担起来，让佩弦更好地去研究学问。

婚后，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佩弦对扬州很有感情，那里的一山一水他都热爱，尤其留恋扬州的瘦西湖。他曾带我和孩子们一起去逛瘦西湖、平山堂。那天佩弦很高兴，津津有味地给我们介绍湖山及各处的风景，说得是那么生动，使人觉得真象是在诗画中一样。看到他那么高的兴致，我不禁笑着说：

“我看过一篇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章，把那儿写得那么美，其实不过是一湾臭水。真是文人哪，死人都说得活！”佩弦说：“喂！不要当面骂人呀！”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佩弦对扬州的一切都感到亲切。连扬州的饭食都非常喜爱，尤喜扬州的荤菜“狮子头”。在扬州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去扫坟。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烈。他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

返回清华大学后，我们住在北院九号。那时清华大学规定教

授太太不能在清华工作，主要是禁止家属参预学校的事，我便想去城里教书。但是当时由于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了，各个校都发不出薪水。“女子文理学院”倒还发些钱，但我挣的钱连应酬都不够，无奈只好不工作了。

佩弦这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工作很忙，一边担任教学工作，讲授三门课程，一边从事写作。为了探索新文学的道路，使新文学大众化，他还深入到下层老百姓中间，了解大众要求，学习民间语言。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到劈柴胡同的茶社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那天我们听了刘宝全唱的《西厢记》，还买了《刘唐下乡》的唱片。佩弦还常常自己去听。他是想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些经验，研究新诗大众化问题。佩弦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为提倡新文学而努力着。

婚后第二年，我们便把两个孩子从扬州接到北京来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便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事先佩弦便与我商量好，对孩子的教育要双方取齐，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要事后再商量。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

两个孩子都是在城里读书，住在学校，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在思想品德上鼓励他们进步。女儿本来在教会学校读书，因为参加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游行，被学校不挂牌除名了。当校方把我和佩弦找去时，我们未责备孩子就将她转学了。记得抗战胜利回北平后，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好心的朋友对我说：“这孩子在学校活动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现在太危险啊！”佩弦知道后对我说：“左，左才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难道

还叫孩子右吗？”孩子做得对我们就支持，在家里我们一直是鼓励孩子前进的。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俭朴。佩弦的收入要寄一半给扬州，我们留用一半。所以每逢给孩子们交学费时，都要借一个月的薪水。佩弦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交信时，如里边有私人信件，都要给当差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作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所以清华的老工友都说：“朱先生可好啦！”他在家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后来还是我讲：“让孩子们做事不要这样说，显得都没有父子感情了。”这样他才慢慢改了。

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他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他的学生。一九三五年冬天，北京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六日，北京三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头天夜里，佩弦对我说，他很担心学生又要流血。想起过去反动政府的种种暴行，他很为学生的安全忧虑。但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第二天，他便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当听说许多学生在城里受伤时，他深感反动政府的残酷，很难过。

后来，佩弦还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回来便对我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要依

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佩弦从这位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度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生活的。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爱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一生精雕细刻，锲而不舍；他爱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多远都怀念着它；他爱自己的亲人，是那样质朴、挚诚；他爱自己的学生，为他们的安危焦虑不安。他的感情象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八 年 离 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的生活也是颠沛流离、极不安定的，但这却使佩弦更加振奋了，他随着抗战的形势而忧喜，他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初期，有个日本文化特务名叫“三室三良”的到清华作研究生。这个人时常请客，校长、院长、系主任、知名人士他都请过。每逢请客时，佩弦总是推说有事，一次也不去参加。一天，三室三良又请他，并说：“你哪天没事就哪天请，下礼拜没有事吧？”结果到了请客那天，佩弦找了一辆车，把全家人都拉到大觉寺去看玉兰花了。这样就得罪了这个日本人。后来一个人告诉我说：“竹隐，日本人可注意佩弦了。”北京沦陷后，梅贻琦校长先带一些职员南下长沙，不久来电报叫佩弦也去，于是佩弦马上南下了。走的那天，他戴着一副眼镜，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加上他个子也不高，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总算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佩弦南下到长沙，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此校后又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到云南蒙自，以后又迁到昆明。

抗战的第二年，我也随清华、北大的一部分家属离开北京南下。

那时日本人的吉普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在告别北京时，我差点叫日本人的车撞上，结果我坐的三轮车翻了，车夫受了伤，我的脚也崴了。我就是一瘸一拐地启程南下的。在南下的船上，我们还遇到日本人的搜查。日本兵把全船的人都轰到甲板上，排成一队，挨个检查。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使用装水果的大蒲包把头一裹就拉走，完全不由分说。看着这蛮横的情景，真使人体会到亡国的痛苦。

船快到越南的海防时，又遇到了台风。大风大浪打得船上下颠簸。大家都翻肠倒肚地吐呀，吐呀！放在格子里的暖瓶全摔碎了，人也根本无法躺在床铺上。我的大女儿在隔壁舱房里边吐边哭喊着：“娘啊！我冷啊，冷啊！”而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我在舱里死死用两手抓住栏杆，用脚抵住舱壁，挡着两个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来。听着隔壁女儿的哭喊声，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大风浪整整折磨我们一夜，第二天风浪小了，可厨房里的盘碗餐具都打碎了，大家都只好饿肚子。

船到海防靠了岸，佩弦等人都已在那儿焦急地等着我们了。那地方风景可真美呀！到处都是绿树，绿叶中间花儿是那么红，红得艳极了。可那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这美丽的土地是在殖民主义者铁蹄的践踏下，越南人也饱尝着亡国的痛苦。越南老百姓连房子开个窗户都要经过法国人批准。在码头上，穷苦的搬运工人为了

生活拼命地抢着搬行李。在旅馆里，法国有钱的人常常用鞭子抽打这些穷人。佩弦有时见到这情景，便气愤地制止说：“你不要抽他，他是中国人！”佩弦还很动感情地对孩子们讲：“我们要亡了国，也会象他们那样！”

佩弦的心与抗战的局势是紧紧相连的。他为中国的抗战而振奋。在“七七”抗日战争两周年时，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地歌颂抗战。他写道：“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作战，我们也能迅速地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他对抗战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相信中国会有光荣的将来，他认为“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听说共产党收复失地，情绪可高了，佩弦的乐观情绪和自信心与当时的一些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成了鲜明的对比。

佩弦对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手段很气愤。他曾为《云南日报》写过一篇社论，题目是“新闻用字之巧妙”。抨击所谓“有计划的撤退”的报导。国民党当局把不战就逃跑说成是“我军有计划地撤退转移”，说成是“为了更好地有计划地进攻”，佩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报导不真实，是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手段。

在云南蒙自和昆明的时候，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佩弦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仍是夜里十二点钟以后才休息。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自己毫不放松。他工作起来仍是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容拖延。有一次佩弦得了痢疾，可是 he 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我劝他休息，他只是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他书桌边放着马桶，

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三十多次。天亮后，我看他脸色腊黄，眼窝凹陷，人都变了相。而他却脸都没洗，提起包就去给学生上课了。抗战胜利后，他病重时还提起这事说：“我的身体不行了，悔不该那次拉痢疾还熬夜，使身体太亏了。”佩弦一辈子作事都是言而有信的。只要是他答应的事，过多长时间他都记得，多么艰苦都要作到，而且大事小事都一样。记得我们刚结婚要回扬州老家时，他对我讲：“回去可得磕头呀！”我便笑着说：“好，到你们家磕头可以，那你到我们家也得磕头呀！”谁知这一句玩笑话佩弦却记了近十年。抗战时我们逃难到成都，他一到我姐姐家，便给祖宗牌位磕头。我姐姐拉他说：“哎呀，不要磕头，你穿的是西装。”佩弦说：“以前说好的要磕头。”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他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给学生改作文都是字字斟酌的。有一回他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字吧！我想还是原来那个字好。”抗战期间，我们辗转搬了几次家，生活很不安定，住房也困难，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佩弦安排出一间书房，让他能安心读书、写作从事他所喜爱的事业。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的统治更加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些人却大发国难财。眼看着生活愈益艰难，没办法，我便带着几个孩子回成都了。那时我又怀了小女儿，身体也很不好。一路上不断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一天，在快到重庆的路上，忽然飞来大批日寇飞机，一下子天都黑了。当时，卡车一停，别人都跳下车到路边树下躲起来。我一个身体不灵活的女人，又拖着一个四岁多、一个六岁多的孩子，怎么下得去呢？孩子们吓得直哭，喊着：“妈妈，我们怎么办呢？”我真是万般无奈，只好安